

陪送愛羅先珂的“ 美国人” 新探

秋吉， 收

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国際文化共生学部門・国際文化学講座

<https://doi.org/10.15017/7410587>

出版情報：言語科学. 61, pp.15-27, 2026-03-14. 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陪送爱罗先珂的“美国人”新探¹

秋吉 收

一九四五年，徐玉诺回想起鲁迅所创作的诗《始终对不起他一怀念鲁迅先生》²中有附上的亲笔写的附记。

附记一：一九二〇年鲁迅先生收我《良心》等二十篇小说，拟出版，并长序，由孙伏园致函相商，被我婉拒。³

附记二：一九二二年⁴我上北京，登广告找事，刊入“出卖百物”栏。

后忽传鲁迅先生著我送爱罗先珂君。但不知何意。

当时，军阀的抗争、匪贼的灾害十分激烈的河南的贫穷农家出生的徐玉诺，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开始陆续发表了始终如一地如实描写农村惨状的作品。其次，《故乡》、《阿Q正传》等，同样自觉埋头于描绘出中国现实农村的鲁迅，比谁都要更早地注意到当时籍籍无名的徐玉诺，再三地写信寄给他，甚至愿意亲自为其写序文那么热心地劝他出版小说集。对像徐玉诺这样遥远无名的农村青年，鲁迅这方如此积极的态度是很少见的。由此，可以窥见当时，在鲁迅的心中，徐玉诺是如何被强烈地关注到的。⁵

回想鲁迅的诗的附记的二中，谈起了鲁迅让徐玉诺陪同俄国的盲人作家爱罗先珂回国的事。另外，依照以下所举的《徐玉诺年谱》⁶，徐玉诺所说的报纸广告被周作人等人见到，他被接到了八道湾的周家。

四月初，……至北京，五日刊登谋事广告于《晨报》第七版“介绍职业”栏，（中略）被周作人等见到，遂将徐玉诺接至八道湾周家。（中略）16日护送爱罗先珂回国而去东北。

¹ 汪忆霏（九州大学博士研究生）译。

² 徐玉诺诗「始终对不起他一怀念鲁迅先生」 1981年9月3日《河南日报》所载，栾星《鲁迅与徐玉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所收。

³ 《良心》在1921年1月7日《晨报副刊》上刊载，鲁迅劝徐玉诺出版小说集是1920年这个时间明显是错的。可以推测正确的是21年末到22年这个时期。参考拙稿《鲁迅编未完〈徐玉诺小说集〉考》（《九州中国学会报》第30卷，1992年5月）

⁴ 徐玉诺登出的广告在1923年4月3日・4日的《晨报副刊》可见，依据《鲁迅日记》爱罗先珂的归国也是23年4月16日，所写的1922年是错误的，实际是1923年。

⁵ 并且，关于文学史上被置于“乡土作家”这个位置的徐玉诺的小说与鲁迅的关系，拙稿《作为“乡土文学”作家的鲁迅与徐玉诺》（《中国文学论集》第20号，1991年12月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参照。

⁶ 刘济献《徐玉诺年谱》《文学论辑》第二辑（1984年3月，河南人民出版社）256页。拙稿《徐玉诺年谱试稿（上・下）》（《天山牧歌》第九号・第十号，1990年10月・1991年3月、诗志《天山牧歌社》）参照。（现在，秦方奇编的《徐玉诺诗文集》（2008年、河南大学出版社）附《徐玉诺年谱简编》是最完整的。）

当时，八道湾的周家中，也一起居住着爱罗先珂以及鲁迅此人⁷。鲁迅正积极地翻译发表盲人作家的作品。⁸在过去热心地鼓动徐玉诺的鲁迅，这次把陪同他个人崇拜的作家爱罗先珂回国的大任务交给了这个时候已经正在成长为小说、诗两面开花的文学研究会的主要作家之一徐玉诺。

※

这里有一份资料。河南平顶山市发行的《平顶山市文史资料》〈第一集〉（1988? 年⁹）中收录的王予民、谢照明《诗人徐玉诺的一生》¹⁰。平顶山市是徐玉诺故乡鲁山县现在所隶属的行政区域，也就是说这是由当地人所作的徐玉诺的研究。资料中，徐玉诺的北京行，以及爱罗先珂回国的时候徐玉诺是如何与鲁迅周作人来往的，还有徐玉诺的随行爱罗先珂的样子都详细地被记载着。且引用相关部分。

徐玉诺还与鲁迅及周作人有过接触。一九二三年四月，玉诺受鲁迅及周作人之托，与当时寄住在周家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同行去东北，送爱罗先珂回国。此事说来有趣，那时鲁迅与周作人正寻觅合适的人送爱罗先珂回国，有一天忽然看到了《晨报》第七版“分类广告”的“介绍职业”栏里，登了一个徐玉诺的求职启事：“徐玉诺君愿充各级学校文学教授，或各报校对及各种书记员，每日可工作十个至十四个钟头，月薪只须十二元。高师**罗绳武**启。”这则启事的左侧即为“百物出卖”栏，这则启事登出后，一时传为“卖身启事”的笑谈。周作人将玉诺接到了八道湾家中。问玉诺缘何到京，玉诺笑笑说，他从河南临颖送一个朋友北上。把朋友送上火车后，似乎还有许多话没说完，就决定把朋友送到郑州。一路上谈论得十分热烈，火车什么时候到的郑州也不知道。当火车在郑州又开动了，方才惊觉。就索性将朋友送到北京。到京后，二人分手，自己才发现身边带的钱还不够买回去的车票。只好将随身的衣物作抵押，寓居前门外西河沿一家最寒伧的小客栈。去高等师范找旧日的同学罗绳武商量办法，罗是个穷学生，也

⁷ 《周作人日记》「1923 年 7 月 20 日」记载了“得徐玉诺君函”，「1923 年 7 月 21 日」记载了“徐玉诺君来访”、这个时候，徐玉诺也有可能见过鲁迅。神奇的是“7 月 21 日”这个日期正是周作人提出与鲁迅绝交的“7 月 19 日”的两天后。然后在 9 天后的“7 月 30 日”周作人写了《寻路的人 赠徐玉诺君》，这“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与所写的对人生的怀疑、人生的虚幻的内容，没想到仿佛是 10 天前给鲁迅的诀别信的内容。周作人对来访八道湾的徐玉诺说了什么自然是不清楚，但不一定没有提及两天前给送了绝交状的鲁迅。正如大家所见，徐玉诺有着与鲁迅不浅的关系，可推测因此周作人对徐玉诺有很深的信赖。然后，这个周作人与徐玉诺的深交（如在给萧军的信里窥见的徐玉诺“排除”）也影响了徐玉诺和鲁迅的关系是不是臆测过度了。

⁸ 收入 1922 年出版的《爱罗先珂童话集》的九篇为始，鲁迅在不到两年间共翻译发表了十四篇。其次，关于鲁迅与爱罗先珂的关系，藤井省三《爱罗先珂的都市物语》（1989 年，美篇书房）做了详细的考证。

⁹ 因没有记载出版年份，根据所收记事来推测。《平顶山市文史资料》第九辑（2000 年）以“五四诗人徐玉诺”为名，收录了从鲁迅、矛盾的对徐玉诺的提及，到当地人写的有关记事·回想、有关资料目录、《年谱》达 50 篇文章的一本特集。拙稿中引用的王予民·谢照明《诗人徐玉诺的一生》被这个第九辑再次收录，《后记》中有“此文八十年代曾在《奔流》杂志刊出”的记载（待考）。收录资料中特别引起关注的是，罗绳武的回想记《诗人徐玉诺二三事》等（后述）。

¹⁰ 作者王予民是 1945 年、河南省杞县的出身。河南教育报刊社编辑、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谢照明是 1938 年、浙江省宁波的出身。1961 年中山大学历史学部卒、平顶山师范专科学校历史学部教授。河南省政协委员、平顶山市政协副主席。且，也从平顶山学院的秦方奇教授、徐玉诺的故乡河南省鲁山县的史大观先生、徐帅领先生（两位是鲁山一高的教员，徐帅领是徐玉诺的曾孙）、海因先生（鲁山县出身，现住郑州市的企业家）等民间研究者获得了很多消息，给了我很多帮助，在这里表示深深感谢。这几位老师是在 2014 年在平顶山学院召开的《首届全国徐玉诺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见面认识的。徐玉诺的女儿徐西兰女士（2018 年逝去）也从武汉赶来参加这个学会，对海外唯一的一位参加者的我的来访感到十分高兴。关于那个时候的情况，参照拙文《〈首届全国徐玉诺文化学术研讨会〉参加记》（2015 年 3 月《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第 400 期纪念号，75~77 页）。

无力接济玉诺。二人商量，由玉诺在《晨报》登个觅职启事，能工作一个月就够南归的路费了。周作人听后，就留玉诺在京住些日子，到处看看，访访朋友，并允南归赠给路费。当周作人说起爱罗先珂即将返国，乏人相送时，玉诺提出愿伴盲诗人去东北。周作人说，恰好吉林毓文中学正在关内聘请教员，“文学研究会”的朋友王统照已先期前往，你若愿意，不妨到那里教一段书，也可增广见闻。玉诺答应了。鲁迅与周作人觉得玉诺是位极靠得住的朋友，就托他沿途照料盲诗人。玉诺一直把爱罗先珂护送到哈尔滨，才折身去吉林毓文中学。（中略）

后来玉诺在抄给栾星的一首诗中又云：

“北京生活真不易，

卖身广告无消息。

忽传指示上东北，

叫送爱罗回国去。

附记：一九二二年我上北京，登广告找事，刊入‘出卖百物’栏，后忽传鲁迅先生着我送爱罗先珂君，但不知何意。”（所记年份有误，应为一九二三年——引者注）

虽关于这个原典没有逐一记载，但这里所说的经过是十分具体的，我想并不是想象的产物。参考了徐玉诺自身的文章、追述，再加上如“脚注9”中所引的（现在还未整理的）《记录·回想》还有张默生著的《异行传》（1987年，重庆出版社）收录的《记怪诗人徐玉诺》¹¹，以及《徐玉诺文选》（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末尾附载的编者刘济献所编的详细年谱等等许多资料所完成的吧。¹²

文中看到的王统照（1897-1957，字剑三，山东人）的名字也是一个线索。徐玉诺1923年6月1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小诗》中，写了如下文字：

冰的世界也罷；

我的主宰！

——只要不擾亂我春之夢。

——長春下車，北風冰冽，大雪紛紛，連那好爭則強的愛羅先珂先生，也顫抖着叫起「極冷」來！但他尚幻想夜鶯在俄國，我呢？……………（中略）

我的劍三兄呵！現在我還能寫信給你。——

——四月二十四日，玉諾。

如后所述4月16日伴随爱罗先珂从北京出发的徐玉诺，在24号给“剑三兄”即王统照寄了信。而且，徐玉诺与爱罗先珂出发的第二天4月17日《晨报副刊》刊登了王统照（署名：剑三）的诗《赠

¹¹ 郑州、北京行与“找工作”广告，送爱罗先珂归国至吉林等事都可以看见（119页）。其次据著者张默生徐玉诺的事在《宇宙风》半月刊上也有写过的事（128页）。现在还未发掘的徐玉诺的相关资料这里也有。

¹² 刘济献《徐玉诺年谱》各处都有“根据《自传》”的记载。在2014年的学会上笔者直接问了秦方奇教授（《徐玉诺诗文辑存（上·下）》（2008年，河南大学出版社）的主编，徐玉诺研究的第一人，平顶山学院教授），他和我说过这本《自传》“现在还不明确”。（待查）

玉诺》。周作人在内的三人之间是有着怎样的关系往来，详细的并不清楚，但徐玉诺的寄给王统照的诗中可以看到的爱罗先珂可以确定是一个关键词。顺便一说，徐玉诺刊载《小诗》1923年6月1日的《晨报副刊》的同一版面的卷头论文是王统照的《本刊的缘起及主张》¹³，这后面登载的是周作人的《艺术家与道德》，然后卷末是这首徐玉诺的《小诗》。文学研究会作家的三人当时确实是在互相呼应。并且，最后的“文学研究会启事”部分可以看见“本会于前两礼拜曾开过一次常会，改选王统照为本期书记干事”的文字。

虽说徐玉诺是毫无准备从河南省的农村来到大都会北京，但当时却已经以文学研究会的重要诗人而活跃的。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同人，且在4个月后的1923年8月1日在北京《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第7号上写了《寻路的人—赠徐玉诺》的周作人，恳切地迎接他并不是难以想象的。当时与周作人一同居住的，还有同样被爱罗先珂的文学深深吸引的，且过去在1920年热心怂恿徐玉诺出版小说集的鲁迅，在这个时候见过徐玉诺也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¹⁴。被徐玉诺拒绝了出版小说集而怀恨在心的鲁迅不得不故意不见，恐怕也没有这样的事吧。

另外，引用部分的最后所引用的，写完交给记事的作者栾星的徐玉诺的诗中的写下了“忽传指示上东北，叫送爱罗回国去。”，且徐玉诺特意自己写了《附记》“后忽传鲁迅先生着我送爱罗先珂君，但不知何意。”这作确认的意思不小。考虑到徐玉诺的本性，很难想象他会到弄虚作假的地步。反而，已经在文坛有了稳固地位的徐玉诺与爱罗先珂，如果说是“偶然的”同一天乘坐同一班火车回去的话，这难道不是反而不太自然吗。盲了的爱罗先珂的归国之行还是有必要有既会中文又可以信赖的人一同随行的。徐玉诺若是能担任这项工作的话，对于爱罗先珂的保护者周作人以及鲁迅无疑也是极其感激的事。

这里，想先引用在引用文中登场的徐玉诺的河南第一师范学校时代的同窗，罗绳武（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国文学部的学生，也师从于钱玄同，李大钊，鲁迅）的话。他自身也没有余裕无法援助徐玉诺，提议在报纸上登一个“卖身广告”，在联系方式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等十分舍身忘我地对应这件事。可以容易推测到徐玉诺对其信任是深厚的。刘增杰著《鲁迅与河南》（198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如下记载了这个罗绳武的话：

武者（罗绳武）告诉笔者：“我和徐玉诺是老朋友，徐玉诺曾对我说过：鲁迅和我见过面，对我抱有希望。”¹⁵

*

Y先生的见解之徐玉诺陪同爱罗先珂归国这件事与周作人鲁迅没有关系的论据，如以下所述：

¹³ 《晨报副刊》在1923年6月1日开始在纸面上创刊了《文学旬刊》之后每10日纸面的标题由《晨报副刊》改为《文学旬刊》。

¹⁴ 2021年9月绍兴文理学院召开的“2021中国鲁迅年会”发表的赵焕婷《徐玉诺与周氏兄弟交往关系考辨》（《鲁迅诞辰140周年暨“鲁迅与现代文化价值重建”国际学术研讨会（第六届绍兴文化峰会）论文集》1095-1105页）详细考察了徐玉诺与鲁迅周作人的关系，关于会面的事，包括其结论的“见了”与小论的见解重合的部分也不少。

¹⁵ 刘增杰著《鲁迅与河南》（198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73页。刘增杰是1956年河南大学中文系卒、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罗绳武（1903-1995）、河南省新野县出身。1923年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入学。

1923年5月2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一篇题为《出京后的爱罗先珂》的文章。这篇文章题目下有周作人的“附记”。“附记”的全文是：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来信，他在车上遇见爱罗君，同到长春，以后往吉林去，便写这封信来报告爱罗君出京后的情形，我觉得颇有发表的价值，所以转送给《晨报副刊》。他是现代的一个知名的诗人，因为未曾得到他的许可，只用两个字母替代他的姓名。

四月二十八日，周作人附记。

周作人为这位“著名诗人”改加的字母是“JN”。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位诗人就是徐玉诺。因为周作人4月26日日记里，有收到“玉诺吉林函”的记录。他在28日写好“附记”，继而由《晨报副刊》在5月2日发表。这件事的脉络应该就是这样。

那么，徐玉诺或“JN”在信里说了些什么呢？开始一段这样写道：

本月十六日下午七点钟，在车站与爱罗先珂君相遇时，我已见着你那里的亲人；我曾要他告诉你，“我要到吉林去，在路上爱罗先生不要太寂寞了。”这层大概你也许早已知道的。

首先，“七点钟”，应当正是鲁迅与张凤举等人聚会时，这位“亲人”就不会是鲁迅了。又说是让这位送行的“亲人”转告周作人，他自己恰好要到吉林，路上正好可与爱罗先珂作伴。如果是周作人请他去送的，那就不必说在车站相遇，更不用解释说“我要到吉林去”。而后面的“早已知道”，应是指“亲人”回家后定已向周作人报告过车站相遇事。¹⁶

徐玉诺在随行爱罗先珂之后，写信给周作人，告诉他那时的情况，这里写了“在车站与爱罗先珂君相遇”。Y先生认为如果是受周作人委托的话，那这里不需要写与爱罗先珂“相遇”，也不用特意让人转告“我要到吉林去”。然而，徐玉诺在文中写的是与爱罗先珂的初次见面，这样的话特意写“在车站‘相遇’”似乎也没什么奇怪的。关于给周作人的传话还留有疑问，但显然特意想要传达的是后半句的“在路上爱罗先生不要太寂寞了”。自己与爱罗先珂同行确认到他的确要免不了寂寞了这件事，首先要使（委托人）周作人安心。本来，如果事先没有计划，中国的那个很长很长的列车与乘客间杂乱拥挤的（徐玉诺自己，在信中形容的是“一大群人”）的那个车站与车内，偶然地碰面是可能的吗？而且，徐玉诺没有见过爱罗先珂。万一偶然地与爱罗先珂有了接触，河南农村的徐玉诺果真能与从未见过的这位眼盲的白人搭话吗。冷静且认真地与爱罗先珂交往的样子来看，可以感到确实做好随行的任务的徐玉诺的诚心诚意。然后顺利地结束任务的徐玉诺，便写信寄给周作人好好地做了报告。重新在看一遍徐玉诺的信开头部分吧：

本月十六日下午七点钟，在车站与爱罗先珂君相遇时，我已见着你那里的亲人；……

我觉得可以感受到是向周作人作的任务报告的一个很自然的开头。首先报告了在受委托的时间，地点准确无误地“相遇”了的事。问题在于这后面的一句话。“我已见着你那里的亲人”，“（在那里）

¹⁶ 2020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刊载、Y文、108页。

我（也）已见着你那里的‘亲人’”。Y先生所说明的“这位‘亲人’就不会是鲁迅了。”（？）因为在集合时间的7点，鲁迅与友人们正在聚会，所以“亲人”不可能是鲁迅。这里似乎在说秋吉所认为的徐玉诺可能见过鲁迅的一丝线索希望也被剪断了。可是，徐玉诺向周作人称鲁迅为“你那里的亲人”，这本就是不可能的。谜底很深啊。

这里我想来确认一下1923年5月2日的《晨报副刊》上的记事。

三期星 日七十月三年亥癸歷舊即 刊附報晨 日二月五年二十國民華中 版二第

雜感

出京後的愛羅先珂 J N

這是我的一個朋友的來信。他在車上遇見愛羅君，同到春，以後往吉林去，便寫這封信來報告愛羅君出京後的情形，我覺得頗有發表的價值，所以轉送給晨報副刊。他是現代的一個知名的詩人，因為未曾得到他的許可，只用兩個字代替他的姓名。四月二十八日，周作人附記。

本月十六日下午七點鐘，在車站與愛羅先珂相遇時，我已見着你那里的來人；我曾要他轉告你，「我要到吉林去，在路上愛羅先生不至太寂寞了。」這層大概你也許早已知道的。

在車站開車時，有一大群人來送行，還有兩個人同到天津去；在這中間，因為我不懂世界語，所以也不曾同愛羅先生談過話。

自天津開車，時間已在十一點鐘以後，外面又浙浙瀝瀝地下着雨，一時車上分外冷靜，只有火車沉沉悶悶地在黑暗中走著。

我和愛羅先生是第一大見面。……我告訴他，「愛羅先生，還有我在這裏。」

他問過我的名字，便很慎重的說，「在路上有日本威別國的警察來搜查的時候，你就說我是你的一個殘廢的朋友，那麼我可以少受些麻煩……」

他又很經心的要點給他所帶的行囊，我問他要不要將棉被展開，他為省事起見，倚著一個大的包裹睡了，他的捲髮很枯焦，他的呼吸漸低微了。這時滿車人——大半是作工的——也都垂頭打鼾，被車搖動着。

一直到天明，我因為英語也不甚好，——我們當時只是彼此特意說了一聲，表示我們正在親近，有時我問他，「去廁所不去？」「要水不要？」另外沒有什麼話說。

山海關已過去了。這時雨勢風聲漸著，下得更大，也却還是上醒的睡著。在奇異的過去之後，有一羣穿黃衣的軍官指著愛羅先生所倚著的包裹問是誰的東西，我答說是我們的。有一個胖的很嚴厲的說，「搬起來！」他們說著走過去了。我正想著不應該去驚動他；實在車上還有許多國人比我們佔得更寬。有幾個工人也說，不必搬了。

「怎麼，拍亂感？」我還沒有見他們，這嚴厲的吆喝直是冰一般的落在我頭上。

我簡直不能容忍了，我告訴他說，他應該有這坐位的權利，——他是殘廢者。

那個胖的惡很很地用刀打著木板說，「你就是得搬，搬，搬」這時愛羅先生也驚醒了，他很驚慌的問，「怎樣的，……什麼事？」

後來有一個奉天高師的學生和兩個工人都顧立着，讓出這個坐位，纔算了事。

在奉天候車室中，那些日本人都用特異的眼光看我們。我不直看他們，他們也沒同。他們大概認愛羅先生為英國教士，所以我們很平安地通過了。

在長春——因為尚有兩個鐘頭的工夫——我們曾到棧房裡少為休息。很壞的飯菜，沒有一樣是愛羅先生所能吃的；他只吃兩個梨。我送他到俄國的車上，那車上的情形他很熟悉，所以我很放心的往吉林去了。

到現在，我的心理却發生了一種很沉重的潮慮。一則見報上載哈爾濱的水災，火車不能行走。二則他從長春上車時天正要下雪，他發著抖不斷的說「很冷，很冷」我恐怕他要害病。

愛羅先生曾說，為免除痛苦而回俄國，我恐怕俄國更要給他大的痛苦罷，——本來那里的冰正在加厚呢。

四月二十三日夜，自吉林。

原来，信件里的“亲人”是“来人”的错写呀。虽说相似（？），但1923年的报纸上如果出现的是“亲人”自然应该写的是繁体字的“親人”吧。

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已经明了了。也就是说，总之，徐玉诺在这里说的是周作人在徐玉诺以外还安排了一个人来陪同爱罗先珂。（也把这件事事先告诉了徐玉诺），徐玉诺是在报告在车站也见到了从周作人那里得知的这个人这件事。

“我已见着你那里的来人”

写着“你那里的”表明徐玉诺是清楚周作人和这个“來人”的关系的。是谁告诉他的呢？这无疑是周作人了。其次这里还有着“已”和“着”两个字。也就是说，徐玉诺正是因为事先从周作人那里得到了这个“來人”的情报所以才在这里写着“已见着”。¹⁷

另外，如果仔细阅读徐玉诺给周作人的信的话，可以看见几处很难认为是“在车内偶然遇见”的场面。特别是下面的场面：

（爱罗先生）很慎重的说，「在路上有日本或别国的警察来搜查的时候，你就说我是你的一箇残废的朋友，那么我可以少受麻烦。……」

爱罗先珂因为是左翼过激思想保持者的危险人物遭到日本方面的驱逐，如后所述，移住到中国以后，平时也处在（日本官宪）当局的严格监视之下。这里所引用的徐玉诺的言辞中也可以窥见，爱罗先珂本人对这个危险是有着强烈意识的。

如果爱罗先珂和徐玉诺在这里是完全偶然遇见的，对于爱罗先珂徐玉诺这个人是完全陌生的一个人的话，真的会如此放松警惕和他说这样的话吗？我认为是从最信赖的周作人（和鲁迅？）那里，被事先告知了随行的中国人的存在，这才在对徐玉诺这个人进行谨慎确认之后，爱罗先珂对初次见面的徐玉诺给予了一定信任，连如何应对警察搜查也与之相谈。

还有一点，令人关注到的还有周作人的言行的可疑处。比如，没有直接称呼徐玉诺的名字而故意以“他是现代的一个知名的诗人，因为未曾得到他的许可，只用两个字母替代他的姓名”来模糊。日本的警察搜查时唯一没有返还的《鲁迅日记》是前一年即1922年份的。1915年的“二十一条”以后，日中关系极度恶化，对左翼运动的镇压也愈发强烈。周作人是不是由于这些事，而想要使陪同危险人物爱罗先珂回国的徐玉诺以及另一位随行者“來人”远离危险的。

与爱罗先珂以及徐玉诺一起行动的这个“來人”是谁呢？正是当时正值少年的米田刚三即卡尔·约内达此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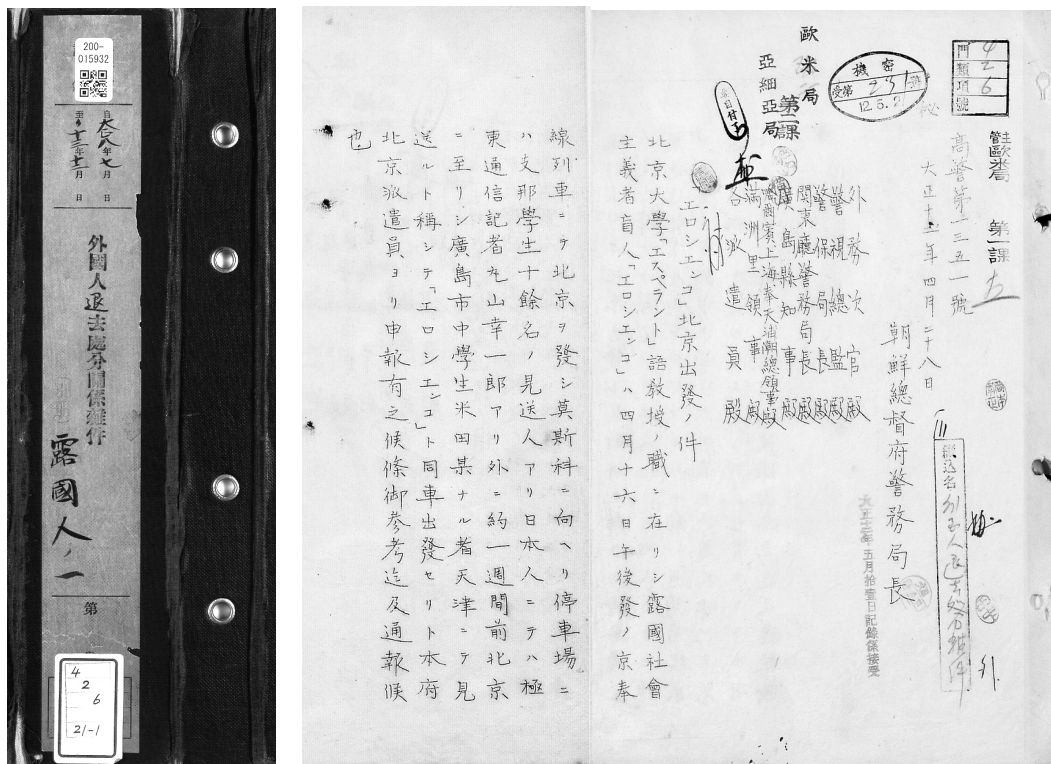
米田刚三（1906-1999），即后来的卡尔·约内达陪同爱罗先珂回国这个事实，是由藤井省三老师发现确认的。在日本因社会主义运动而遭逮捕并在1921年被日本驱逐至国外的爱罗先珂从郭贺经海参崴，哈尔滨到达上海之后又到北京（1922年2月），居住在鲁迅周作人的住所八道湾的四合院，作为北京大学讲师讲习世界语。还在北京大学、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和北京女子师范等学校进行演讲。鲁迅也翻译介绍了爱罗先珂的充满“诗情”的童话作品。

记载了爱罗先珂的归国是有少年米田刚三同行的事实，是藤井老师的《爱罗先珂的都市物语》（1989年，美篇书房）中引用的外交史料《高警第一三五一号 大正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发）》。是从日本被驱逐的爱罗先珂，离开日本之后，日本的警察也逐一调查作为社会主义危险份子的他的动向。

¹⁷ 与注14中所举的赵焕婷老师的论文，虽观点有些不同，但都同样关注到了这个部分，洞察到了徐玉诺与爱罗先珂并不是偶然碰见的。

“爱罗先珂”北京出发之事

担任北京大学《世界语》教授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盲人“爱罗先珂”乘四月十六日午后发车的京奉线列车由北京前往莫斯科停车场上有送行的中国学生十余名和日本人的极东通信记者丸山幸一郎外有约一周前至北京的广岛市中学生米田某称送行至天津，遂与“爱罗先珂”同车出发¹⁸



或是个人浅见，这个事实在中国似乎一次也没有被提及过。且，知网上（全文）检索“米田刚三”，显示有以下两篇论文。陈福康《藤井省三对鲁迅的研究》（《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04期）与靳明全《竹内好与藤井省三的鲁迅论》（《华文文学评论》2013年4月）然而，两篇都只停留在简单介绍了藤井老师的研究成果：少年米田追随爱罗先珂至北京，客居在鲁迅周作人的家里的事。陪同爱罗先珂回国的事完全没有提及。这里引用陈福康的这篇文章。

从藤井的文章中，还意外地获知近年尚健在的著名国际社会活动家、美国共产党党员、日本工人运动理论家米田刚三（卡尔·姚乃达），早年因追随爱罗先珂而曾在鲁迅、周作人家中住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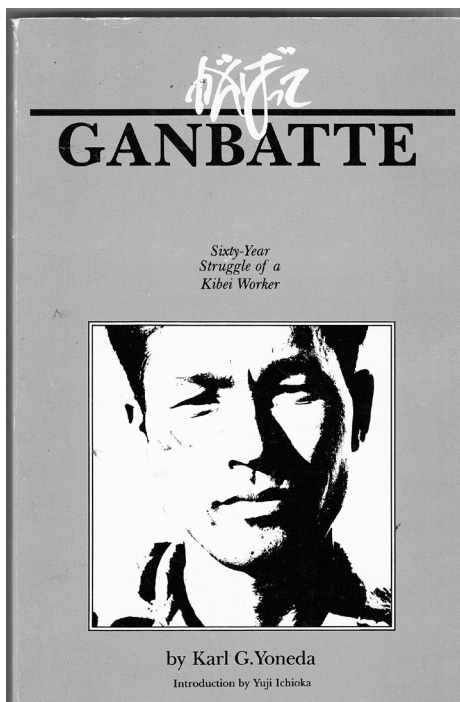
¹⁸ 藤井省三《爱罗先珂的都市物语》，29・194页。笔者向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确认的，资料番号是「4.2.6.21-1 外国人退去処分关系杂件 露国人之部 第1巻」。如后述的藤井省三老师的书简上可见，少年米田也与爱罗先珂乘同一辆列车踏上了归国的旅途，他从北京同乘至天津，后坐船回国。

二个月。此事又是我国研究者闻所未闻的。¹⁹

至此注意到米田刚三的存在中国研究者恐怕没有了吧。Y先生的误认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以下，大部分依据的藤井老师的成果，我想来重新介绍关于卡尔·约内达即米田刚三与爱罗先珂的关系，这里主要关注归国随行的事，同时也想与大家共享这份贵重资料。

首先关于卡尔·约内达的生涯，先以藤井老师的著书、其本人的著书（后述）的记述、有关英文书（比如 Estrada, William D, *The Los Angeles Plaza: sacred and contested spa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8], 162-167.）等为参考简单概括一下。

卡尔·约内达（Karl Gozo Yoneda，日文名：米田刚三）是美国的工人运动家，记者，军人。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格伦代尔经营农业的日本人家庭，父母是广岛县出身，因此是持有日美双国籍的日系二代。他的父亲当初移住到了夏威夷，随着夏威夷被美国合并，又再移住去了美国本土。1913年因为父亲确诊了肺结核，举家迁回日本，不久后父亲便因肺结核去世了。少年米田在“米暴动”等时代的动荡中，作为《中国新闻》的配送员过着苦学生活，同时进入了广岛中学（后中途退学）。这个时候他开始倾心于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以报社配送员主导罢工，沉迷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爱罗先珂等人的作品。其中对爱罗先珂抱有强烈的憧憬，在爱罗先珂被从日本驱逐的时候，为了到北京去会面，他在1922年11月从广岛出发，在下关、釜山打工赚取旅费，经由奉天在1923年2月到达北京，师从爱罗先珂两个月后，4月16日回到日本（这期间的事，参照后面所列资料）。在1926年，逃避了在日本的兵役再次前往美国。同年，模仿其尊敬的卡尔马克思，给自己起了“karl”这个英文名。在洛杉矶做着洗盘子，擦窗户的工作的同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洛杉矶日本人劳动者协会，参加了加利福尼亚各地的劳动运动。1933年美国共产党日语机关《劳动新闻》编辑长。1934年代表共产党报名成为了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选举的候选人，虽落选了但也有很多票数。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2年米田一家被送去了曼赞纳强制收容所。米田在收容所内扮演着如指导者一样的角色，同年11月志愿加入陆军情报部（被亲日派的收容者称为叛国奴），作为美军情报部军曹从军，以



『Ganbatte: Sixty-Year Struggle of a Kibei Worker』
(1983年、UCLA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¹⁹ 该文，49页。

日语宣传班员远征缅甸、中国。1945 年退队。大战后回到加利福尼亚经营养鸡场。1957 年再次在加利福尼亚从事劳动运动。1960 年以后，发表了关于日裔美国人的历史、劳动运动的著作，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进行了讲座。1972 年宣布引退之后，从事人权活动以外，也继续着写自传的工作。1983 年由加利福尼亚授予了名誉表彰状。1999 年去世。

他的著作如下：

《在美日本人劳动者的历史》（1967 年，新日本出版社《新日本新书 36》）

《美国的另一面》（1978 年，新日本出版社）

《Ganbatte:Sixty-Year Struggle of a Kibei Worker》

（1983 年、UCLA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日语版《がんばって一日系米人革命家 60 年の軌跡》（1984 年、大月書店）

《曼赞纳强制收容所日记》（1988 年，PMC 出版）

《一个美国情报兵的日记》（1989 年，PMC 出版）

此外，还有劳动运动史研究会编《占领下劳动运动的分析（劳动运动史研究 55，56 合并号）》（1973 年，劳动旬报社）的卷末上所收的《围绕卡尔·约内达》，也可看见《在〈劳动・农民运动〉上，写了关于美港湾劳动者的一〇〇日罢工系列》的记述（336 页）。（关于杂志、报纸刊载上散落的米田的作品仍待考证。）

卡尔·约内达的著作是从日本人迁移美国的详细历史开始说起，到自身作为底层劳动者，一直以来的为了改善待遇，保全地位，废除差别而猛然投身于劳动运动的严酷的斗争中，一生奉身于此的美国日裔移民的栩栩如生的记录。关于与从来所说的“日本人移民史”的差异，在《在美日本人劳动者的历史》（1967 年）的开头处，米田自身是这么说的：

直至今日所写的在美日本人史，都是胜者的记录，成功者的出世礼赞史，克扣的包工头、只付了最低的租金的大农场主的授位授勋史。虽做着“一获千金”的梦，但却经历着过劳老衰、短命、矿山爆发或者成了废人的，带着这副老废的身体躺在郡立病院、养老院的无名劳动者先驱们，被排除在了在美日本人史之外。²⁰

通读著者的全篇，白人对亚洲人的残酷的榨取和蹂躏的实态、生活的现实由当事者的笔赤裸裸被缀述，感受到的这个荒谬与移民的痛苦，读者也捶胸感叹。朝鲜、菲律宾等同样来自亚洲的移民之间也存在姑息权力矛盾，互相仇恨的事，现实的残酷是难过悲伤的。还有通过劳动运动结识的白人的妻子的婚姻（当时，白人与有色人种通婚是违法的），然后是美国与日本之间纠葛的儿子的人生

²⁰ 米田的这番话《美国的另一面》（1978 年，新日本出版社）的卷末所收盐田庄兵卫（社会运动史・劳动运动史研究者，平和・大众运动家，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的“解说”中也有引用。（231 页）。

的对峙。这些人的模样真的宛如大河小说一般。与劳动者站在一起的米田的著作的还有一根支柱是以《曼赞纳强制收容所日记》为代表的太平洋战争时的美政府的日本人收容问题。个人作为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为了得到对美的忠心的认同的从军，还有在亚洲与日本军的战斗，日语传单的书面作成等，卡尔·约内达的笔致是一如往常地将残酷历史的瞬间切开，展现在我们面前。

*

那么，回到爱罗先珂的归国（米田的随行）。藤井省三编注《卡尔·约内达的北京·在鲁迅住宅的爱罗先珂回想》²¹（《猫头鹰》第7号）上全部再录了藤井老师从米田那里收到的三封信（往来书信）的原文，是极其宝贵的资料。以下，引用与本稿相关的部分。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三日

Fujii Shozo 先生

……

我完全迷上了爱罗先珂的童话集“天明前之歌”，为了去北京访问这位被压迫的盲人诗人，从中学离开从广岛出发是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那个时候是十六岁，对母亲也好友人也好都没有说。

……

在釜山的玻璃工厂工作了两个月之后买了票去了奉天便身无分文了。在那里的俄罗斯人经营的香烟店里工作了两个月后买了去北京的票，在北京大学访问了爱罗先珂，告诉他“如果没能见到你，就打算把《天明前之歌》这本书上的你的油画剪成小份吃下去死。”这个时候是一九二三年二月中旬。即使如此，爱罗先珂好像把我看作日本政府的间谍，不信任我把我寄送去了清水安三牧师的住宅。清水夫人对爱罗先生（我们把爱罗先生作为他的爱称）说“少年米田是认真的文学青年”。（中略）清水夫人去了对面的周作人家说了这个事又说请把少年米田领回去。周作人夫人（日本人）把我接了过来。从这天开始，我与爱罗先生开始了两个月的共同生活。

……

四月十六日（一九二三年）我与爱罗先生乘了同一辆列车，我在天津下车从爱罗先生那拿了乘日本船的钱二十日元回国了，爱罗先生通过海岸线北上直到莫斯科，后来从爱罗先生寄给中村面包房的主人的信那听说，日本的密探尾随着他，在莫斯科与日本警察合伙偷了爱罗先生的五个重要的行李。无论何时都被欺负的温柔的爱罗先生呀。……

Ganbatte, Karl G Yoneda

一九八八年八月三〇日

藤井省三先生

²¹ 1989年12月《猫头鹰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学》（《新青年》读书会发行）第7号。关于《猫头鹰》刊载的《藤井氏与卡尔·约内达的往来书信》周边，关于作为美国共产党员的米田的周边等，承蒙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长堀祐造老师的很多指教。

8月27日的信收到了。

请自由使用我的信。

我滞留在周作人家的时候，我是似乎“被关在”一个房间里的状态，有男佣人一位，他照顾我一切从吃饭到厕所的事，一直由他带爱罗先生来我的房间，郊外旅行，另外也仍记得在树木生长的后院一边做口述笔记一边吃饭。因此对有家人，孩子的事一点也没注意到，也不知道把我这样的少年想成是“狂人”还是“间谍”，……

每天都见到爱罗先生，或是陪着中国、台湾独立革命家们与爱罗先生坐人力车出去郊外散步，或是只有做口述笔记时，没有带去他的房间，一个人的时候闭门不出在屋里看书，又或是在市内散步，就这样我与爱罗先生的关系可以说是老师和学生一般了吧。

……

Ganbatte,

卡尔约内达

四合院这样的闭合的空间内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别说是在同一个地方居住的鲁迅周作人兄弟，除了一位佣人以外，少年米田连家人也全没见过。正如米田自身所说，对素不相识的日本的青年的警戒是很强的吧。应该可以看作是对周家的复杂性²²，或者说当时的冷淡的日中关系等残酷的时代·社会的反映吧。这非常有趣。

最后，从前文所列的米田的所有著作，列举以爱罗先珂为中心的与本稿有关部分。

《加油一日裔美国人革命家60年的轨迹》（1984年，大月书店），20-21页。

对十五、六岁的我最有影响的是，卢梭、克鲁泡特金以及瓦西里·爱罗先珂。爱罗先珂是患有盲疾的俄罗斯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世界语学者，一九一九也来过日本。他用日语写了童话，我对此深深着迷。爱罗先珂因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被日本驱逐，一九二一年去了中国，在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

一九二二年我开始了访问他的旅程。是因为想学习世界语以及想向这位盲人作家学习童话的创作法。我也没告诉母亲，一分钱也没有，一样东西也没带，开始了一边沿途打工赚钱，朝着北京的穷游。在下关的港口，为了赚取前往朝鲜的釜山港的连络船的船票，做了装卸煤炭的码头搬运工。在釜山的玻璃厂做见习工。然后去了满洲的奉天（现在的沈阳）在那里做了香烟商的配送员。到北京的最终行程是坐汽车。这个缓慢的旅行，要四个月。

我找到了爱罗先珂，在他门下，度过了收获很多的两个月。他口述童话，我写下来。之后，给我支付了这项工作的工钱，作为我回去日本的旅费。这六个月的经验，是令人怀念的，至今仍留在我的心中。

²² 鲁迅与周作人的终生诀别是1923年7月也就是少年米田来访的三个月后的事。当时的周家的家族构成，依据藤井省三老师的注解是如下：“母亲鲁瑞（六四岁）鲁迅周作人兄弟以及各自的妻子共七名成人，周作人的长男周丰一（十岁）为老大的五个孩子。

《曼赞纳强制收容所日记》（1988年，东京：PMC出版），70页。

〈5 志愿前往强制收容所*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三十一日〉

闭上眼睛想小憩一会没睡着，过去三六年间的各种事一件件的像走马灯一样浮现出来又逐渐消失。出生后的洛杉矶幼年时代、成长时的广岛小中学时代和辍学、到北京与盲人诗人爱罗先珂的邂逅、无政府主义者时代、在广岛的印刷工劳组和橡胶工人罢工指导、二十岁时为避开征兵逃出日本回到出生地洛杉矶成为农园劳动者组织者的事、加入共产党、参加失业游行进了留置所时，（中略）——现在志愿进入了收容所正在参加营地建设。

《美国情报兵的日记》（1989年，PMC出版）

（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日~七月三十一日）

来到昆明已经过了一个月了。想起来的话，从现在算起的二二年前的一九二三年二月中旬，我在北京大学访问了盲人诗人瓦西里·爱罗先珂。只是市不同，但南京虫和虱子蔓延，乞食者纠缠跟随的情况至今也没有改变。他们一直跟到饭店里索要金钱，店主驱赶他们的话，他们便主张争辩乞食的权利。（159页）

正好这个时候，战前作为无产阶级作家被熟知，流亡至中国与日本俘虏一起进行反战活动的鹿地亘访问了 OWI 本部，聊了关于延安本地的宣传工作。他读了我起草的《日本的将来会怎样》十分感动，请求说“想稍微修改一下，以延安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之名出版”，获得了本部的 OK 便印刷了两万部。（167页）

米田和爱罗先珂的接点暂且先列举以上。本稿是以针对 Y 先生的批判的解释为中心，因此关于各个课题还没能再深入。通过世界语爱罗先珂而产生的与当时的中国文坛的关系、通过更进一步发掘徐玉诺有关资料，我想可继续深入研究。